

## 中国新老人： “出钱可以， 但别让我们带娃”

清晨，刘女士轻摇折扇，走在通往公园的小径上。每走几步，就有熟人跟她打招呼。这是刘女士退休后常来的公园，每天8点，她会在这里和拳友一起打太极，享受晨练时光。与此同时，公园里也不乏推着婴儿车遛弯的老人。

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刘女士，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——拒绝带孙的她，决定把退休生活留给自己。如今，有越来越多像刘女士这样的退休老人，在传统观念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中，尝试与后辈在育儿问题上达成平衡。

这些“新老人”的退休生活忙碌而充实。他们向年轻人学习，积极适应数字化时代。大部分“新老人”表示自己很忙，这与公众对老年人退休生活的刻板印象——普遍清闲、孤独——有所不同。除了体育锻炼、旅行等线下活动，超过半数受访者表示，自己每天忙于在线交流；还有超过20%的老人忙于上网学习，平均在线时长为每天2小时。

他们也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：“退休后，不用帮子女带孩子吗？”

### 隔代抚养是一种选择 而不是义务

刘女士生于20世纪50年代，每月退休金有上万元，加上没有房贷，生活相对宽裕、放松。退休后，她的生活依然丰富：在老年大学上舞蹈课，参与书画协会的展览活动，组织老同学、老同事聚会，与朋友定期结伴旅游，等等。退休这几年，她去过西藏、新疆，冬天去东北滑雪，夏天去云南避暑。

刘女士的想法很有代表性：退休后就应该享受生活，而不是自愿承担照顾孙辈的任务。

与此同时，刘女士的独生女儿李楠正在陷入“丧偶式育儿”的局面：公婆以“退休后还需工作”为由拒绝帮忙；丈夫则忙于创业，经常早出晚归，育儿重担落在李楠一个人身上。

李楠曾请母亲帮忙照



顾孙子。尽管心疼女儿，刘女士还是婉拒了：“我年轻时是职业女性，吃了一辈子食堂，饭也不会做。让我带孩子，比带项目还难。”刘女士建议女儿去月子中心坐月子，之后如果要请专业的育儿嫂，她来出钱。“照顾孩子方面，专业人士比我有经验。如果有经济困难，我可以提供一定资助。我认为，老年人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儿女提供帮助，而不是无条件地全力以赴。”

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多样化的退休生活，而不是绕着孙辈转。他们身体尚属健康，拿着退休金，正是有钱又有闲的时候，学习新技能，参与新活动，人生有无限可能。刘女士说：“退休后才是人生新阶段的开始，老年人的自我实现同样有价值，我们没有义务为子女照顾孩子。”

卢女士的情况和刘女士相似，她认为，“老年人带孙应该是一种选择，而不是义务”。

61岁的卢女士是一名纺织厂退休工人，居住在广州。退休后，卢女士加入一个老年舞蹈队，每天和同伴一起排练，还受邀上过央视。她称自己的退休生活“非常忙碌”。

卢女士的丈夫是本地人，有一些可稳定收租的房产，爱好钓鱼，一出去就是

一整天。而卢女士每天上午8点准时去珠江边和老姐妹们跳舞，10点半“收队”后再一起上茶楼喝茶，她经常坐40分钟的公交车，从海珠区到荔湾区跟老姐妹们碰头：“那里的茶楼平靓正，很抵食（划算）。”

老年人不参与隔代抚养，这种情况在广州绝非少数。通常，这类老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，并不与子女同住，只有周末家庭聚餐时才有机会见一见孙子、孙女。在帮助子女分担育儿压力时，他们更愿意“出钱”而非“出力”。

### 育儿问题的张力

小麦夫妇都是85后，在上海生活。他们是第一代独生子女，也是“421”家庭结构中的夹心层。

小麦今年年初生了二胎，夫妻二人的生活更忙碌了：丈夫每天早上8点前把大宝送去学校，再以最快的速度在8点半前赶到公司。为了节省开支，他们没有给大宝报小学托管班，小麦负责大宝中午、下午的接送，与此同时，她还把刚刚学会爬行的二宝带在身边。

二宝才半岁，如果请一个育儿嫂，每月需要额外支出7000—10000元，这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。小麦和丈夫也考虑过几家早教中心，希望找到合适的托管服

务，但被一年10万元的高额费用劝退。

即将结束产假的小麦，正在为无人照顾孩子而发愁。生育女性的困境一再重演，促使小麦进行思考：“什么样的家庭能让女性在生育后回归职场？一是经济条件允许，请得起保姆的家庭；二是有老人帮忙照顾孙辈的家庭。如果没有能力请保姆，又没有老人的帮助，双职工家庭可能需要牺牲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来照顾孩子，而这个人往往是女性。”

最终，为了支持小麦重返职场，小麦的母亲离开家乡，来上海帮她带孩子。小麦的母亲姓张，今年70岁，退休前是一名教师。张老师说：“我的两个外孙都是我带大的。现在上海的家庭流行外婆照顾孙子，奶奶是几乎不参与的。”

张老师对老人不帮忙带孩子的原因也有清醒的认识：“婆媳关系大都存在问题，隔代教育的差异和矛盾是很难避免的。婆婆照顾孩子往往吃力不讨好，现在许多老人不愿意做。”

社交媒体上，关于“老人带娃”和“老人不带娃”的讨论，两种观点势均力敌。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育儿经。在一线城市，职场压力大，保育系统不完善，房价和育儿成本高昂，年轻人不得不寻求老人的帮助，以减轻经济压力。如今老人们从以往的“无限连带责任”转变为结合实际情况的“有限度的帮忙”，从理所当然的奉献到有商有量的配合，是一种进步。

### 年轻家庭的第二个“妻子”？

因为担心老人不愿帮忙，越来越多年轻人将“是否有老人帮忙带娃”作为生育决策的重要考量。许多人因为难以承担育儿的重担，选

择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。面对生育率的快速下降，“充分利用老年人口和女性人口的红利”，有专家如此建议。

然而，“新老人”并不愿意成为“红利”，而是用行动摆脱传统的规训，做出自己的选择。固然有人愿意为儿女分忧，但也有人渴望拥有自己的生活和空间，过上体面且丰富的退休生活，而不是陷人为子女无条件付出的轮回。

复旦大学教授沈奕斐在《谁在你家：中国“个体家庭”的选择》一书中指出：在城市双职工家庭中，祖父母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，配合儿子、儿媳及孙辈的生活工作安排，隐藏自己的喜好，压抑自己的需求，扮演着完美“妻子”的角色。

沈奕斐认为，当年轻女性在家庭中获得的权利和地位并非来自男性，而是来自上一代老人的让渡。但后者的牺牲、困境，鲜少被提及和重视。

“新老年人”选择不带孩子是个人权利得到重视的体现，也是社会进步和个体自我实现需求的反映。没有什么理所应当的，也没有一蹴而就的共赢方案。社会应提供更多支持，满足年轻人的育儿需求和期望，帮助老人追求自我价值。

张老师说：“等到孙子上小学，我就把抚育孩子的责任还给他们（子女），他们则把自由生活的权利还给我们。老年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。父母辛苦大半辈子了，应该有闲适自在的晚年生活，不必再为儿孙操心费力。”

新舟